

此圖為《易經》之卦氣圖，展示了六十卦在一年中的運行規律。圖中標註了節氣、月令及卦名。

圖中可見的卦名及相關標註包括：

- 乾卦 (Qian)：標註有“乾終於離”。
- 離卦 (Li)：標註有“離陰成”。
- 坤卦 (Kun)：標註有“坤始於離”。
- 震卦 (Zhen)：標註有“震陽成”。
- 巽卦 (Xun)：標註有“巽陰成”。
- 坎卦 (Kan)：標註有“坎陽成”。
- 艮卦 (Gen)：標註有“艮陰成”。
- 泰卦 (Tai)：標註有“泰正月至六月”。
- 否卦 (Pi)：標註有“否六月至十一月”。
- 大過卦 (Daguo)：標註有“大過為陰月於六月”。
- 小過卦 (Xiaoguo)：標註有“小過為陰月於六月”。
- 節氣：如“立春”、“春分”、“立夏”、“夏至”、“立秋”、“秋分”、“立冬”、“冬至”等。
- 月令：如“正月”、“二月”、“三月”、“四月”、“五月”、“六月”、“七月”、“八月”、“九月”、“十月”、“十一月”、“十二月”。

此圖旨在揭示《易經》卦象與自然節氣、月令之間的對應關係，是研究《易經》卦氣學說的重要參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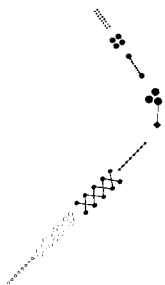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書店



朱震的易学视域

●○唐○琳●著○

中国书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朱震的易学视域 / 唐琳著. — 北京: 中国书店, 2007.7

ISBN 978-7-80663-430-1

I. 朱… II. 唐… III. ①朱震 — 象数之学 — 思想评论

②周易 — 研究 — 中国 — 宋代 IV. B244.99 B221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91481 号

书 名: 朱震的易学视域

著 者: 唐 琳

出 版: 中国书店

社 址: 北京市宣武区琉璃厂东街 115 号

邮 编: 100050

电 话: 010-63017857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 × 960 1/16

字 数: 180 千字

印 张: 12.00

印 数: 0 001—3 000

版 次: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663-430-1/B·138

定 价: 28.00 元

本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印刷公司负责退换。

引 论

《周易》作为一部“极天地之渊蕴，尽人事之终始”的宏著，自产生以来，以其丰富的内涵为历代易学大师所开显。纵观整个易学发展史，就学派而言，大体可分为象数易和义理易。汉代前期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有“《易》十三家”，今已不传，据其书所言，在施仇、孟喜、梁丘贺三位易学大师之前，义理与象数共存并重，孟喜之后，始重视象数，至东汉形成庞大的象数派解经系统，然而繁琐的注经和哲理的不足逐步暴露了自身的缺陷。到了魏晋，王弼纠正象数学之偏，以老庄注《易》，注重义理的阐发，发展了义理易。唐朝孔颖达奉诏撰《周易正义》，取王弼注而为之疏，王学遂成为官学而居尊位，虽有李鼎祚撰《周易集解》，力图挽救汉易象数学，但最终无力阻碍象数易走入低谷的趋势。北宋的义理易因胡瑗、程颐、张载等人提倡而继续发展，其贡献在于改造了玄学易，提升了易学的思辨性，然就易学本身言，仅靠义理阐发《周易》同样有失偏颇。《易》含象、数、理、占四部分，以根源论，《易》源于象数，无象数则无《易》，义理则必须以象数为基础。正因为如此，象数易在北宋初以新的形式——图书之学而复苏，并成为一些易学家关注和探讨的热点，陈抟、刘牧、邵雍等是当时有名的代表，但他们都遭到来自义理派的攻击，程颐、张载等皆反对以象数注《易》。总体而言，两宋之际易学的发展还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斗争，如何从理论上恢复和发展两汉象数易学的传统？如何对待现有图书学派的成果？义理和象数的关系究竟如何？这些问题都成为当时易学家关注和谈论的核心。

朱震的易学形成于北宋末南宋初。作为象数易学的集大成者，他的易学以象数为主，集汉宋易学、象数义理之学为一体。尽管他与当时的理学家往来频繁，与谢良佐关系密切，但这没有影响他以象数为易学之基础的立场。在当时理学家和易学家中，他可谓与众不同、独树一帜。这就预示着他的历史影响和作用不可等闲视之。他不仅继李鼎祚之后进一步整理和解释了汉易中的象数体例，还对自汉至宋图书之学进行了全面的阐释。他对象数派观点的整理和研究，促进了象数易学的影响和传播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，对清代汉学家研究汉易和图书学的演变，起了很大作用。

就目前国内的研究现状看,对朱震易学思想的研究显然过于薄弱,一是材料征引有限,难免以偏概全;一是论证深度不够,未能贯通其易学思想之始终。本书充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,希冀通过深层的史料发掘和纵向比较,尽可能全面深入地考察朱震易学思想的各个要素和环节,本书创新处主要有以下几点:

一是考察了朱震的《周易》文本观,此问题涉及到朱震对《周易》一书性质的判定。朱震对此问题的疏证,在占有的材料、论证的方法与深度上均超过了以前的研究者。他对重卦者、孔子撰“十翼”、古三易等问题均作了深入的探讨,提出了新颖有见地的观点。他关于经传相附的考察论证,启迪了包括吕祖谦、朱熹在内的诸位大师,朱熹《周易本义》篇章结构的安排,以恢复“《易》为卜筮之书”为目的,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朱震。对于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,至今尚无学者给予关注。

二是对其易学中的象数体例尤其是各种体例间的关联进行了考察,这一问题涉及到朱震易学的一个重要特色,即变易及其理论根据。虽然前代不乏有学者谈及此一问题,但多是将其易学中的象数体例作并列论述,没有留意各种体例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关联。该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充分详细的论证,围绕“变”这一主体内容,从气化谈起,由气化到《周易》象数的产生,再从象数体例到取象技巧,层层展开,以充分突显其易学中的变易观。

三是对其易学中的图书学与汉易象数学的关系进行了考察,这一问题涉及到朱震易学思想的时代性和包容性。他以象数易学大师的身份,试图对汉唐以降至北宋易学进行一次全面总结,所以其易学在形式上融象、数、图、辞于一体,在内容上融汉唐象数学和北宋先天河洛学为一炉。本书以对易数图的考察为主体,分析了三十多幅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易图,其中对五行、九宫与河洛学、纳甲与先天学的考察尤为详尽,并断以己意,评价得失。这些均突破了以前学者研究的领域。

四是对其易学的义理归宿进行了分析论证。时贤只是阐发了朱震易学中的象数之学,实际上,朱震作为程门私淑弟子,其易学在很大程度上有受义理影响之处。本书辨析了朱震的人性观、修养论和境界论,指出朱震以得“意”为目的,以象数为基础,将象数与义理统一,表达了宋代象数易学家的人文关怀。

对于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,如朱震的太极观、易数等问题,作者在充分吸取的基础上,力图在深度上有所拓展,使之更加丰富完善。

目 录

引 论

第一章 朱震生平与易学特征 / 1

第一节 生平简介 / 1

- 一、以“经”入仕 / 1
 - 二、往来于理学家之间 / 3
 - 三、主要著作 / 7
- ##### 第二节 易学思想的主要特征 / 8
- 一、以象数为易学之正统 / 8
 - 二、广泛采辑并融汇各家学说 / 14

第二章 对《周易》文本与易学发展源流的考察 / 15

第一节 《周易》文本的形成和演变 / 15

- 一、论重卦之人 / 16
- 二、论爻辞作者 / 19
- 三、对孔子撰“十翼”的思考 / 19
- 四、对经传相附问题的梳理和认识 / 22

第二节 易学发展的源流与对汉宋诸易学大家的评议 / 25

第三章 易学之最高范畴:太极 /30

第一节 批判继承先儒太极说 /30

第二节 太极为《周易》象数之源 /34

第三节 太极为万物之本源 /37

第四节 比较与影响 /40

一、与周、张、程太极观之比较 /40

二、历史影响 /42

第四章 易学之变化观 /44

第一节 由气化而有万物 /44

第二节 卦爻象数是对阴阳变易的模拟 /48

第三节 以“变”为主体,用卦变统率易学中的相关条例 /51

一、对卦变的多种解读 /51

二、以爻象变易为基础的卦变观 /74

三、卦变与卦气 /76

四、对朱震卦变说的评析 /78

第四节 互体之“变” /80

一、“一卦含四卦”——卦中本有之互体 /80

二、“四卦之中复有变动”——由变而产生的新的互体 /83

三、以“变”为基础,以卦变推论互体 /86

第五节 灵活多变的取象方法论 /88

第五章 图书学与汉易象数学的关联 /92

第一节 北宋图书学传承之考察 /92

第二节 河洛学与汉易象数学之关系 /99

一、以典籍取证河洛图书学 /103

二、五行数图和洛书数 /104

三、九宫数与河图数图 /106

四、河图数、洛书数、天地数、大衍数和策数的关系 /108

五、河洛数理与《易》之成书 /108

第三节 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的问题 /115

一、纳甲、月相纳甲图与先天八卦的关系 /115

二、伏羲八卦图 /127

三、文王八卦图 /130

第四节 卦气及其图式 /133

第六章 象数学的义理归宿 /147

第一节 “得意忘象”的言意之辨 /147

第二节 人性善论与传统儒家的修养论 /150

第三节 “立人道以贯天地而为一”的境界追求 /156

第七章 朱震在易学史上的地位 /160

参考文献 /168

(一)著作类 /168

(二)论文类 /170

后 记 /172

评审意见 /174

第一章 朱震生平与易学特征

朱震,字子发,号汉上,湖北荆门军人(今湖北荆门市),北宋末、南宋初的著名学者。生于公元1072年,靖康年间金兵入汴时,已经55岁。南渡后,他只生活了十一年,殁于高宗绍兴八年,公元1138年。现存史书记载他的生平事迹主要限于南宋。《宋史》有传。

第一节 生平简介

一、以“经”入仕

朱震少时在东山书院读书,通过科举考试而取得功名。宋徽宗政和年间(公元1111—1117年)登进士第,此后担任过县令、州官,以廉洁著称。北宋灭亡的前一年,即靖康元年(公元1126年),因精研《春秋》经传,被召为太学《春秋》博士,朝廷的制词称他“推明三家之同异,与诸生切磨,以求合于圣人之意”(《汉上先生履历》,《四部丛刊续编》)。南宋绍兴四年(公元1134年),在江西制置史赵鼎的举荐下,被高宗召见。殿堂上,朱震由于精通《春秋》、《周易》之旨而甚得高宗心意。这次被召不久,便擢升为祠部员外郎兼川、陕、荆、襄都督府详议官,朝廷的制词称赞他“涉道精淳,存心乐《易》,强学力行,白首不衰”(同上)。朱震晚年被朝廷起用,主要是因为他深厚的经学功底,颇得当时的理学家和高宗皇帝的欣赏。任职期间,他把维护辖地的稳定和发展经济作为施政的主要策略,曾向高宗建议:“荆、襄之间,沿汉上下,膏腴之田七百余里,若选良将领部曲镇之,招集流亡,务农种谷,寇来则御,寇去则耕,不过三年,兵食自足。又给茶盐钞于军中,募人中余,可以下江西之舟,通湘中之粟。观衅而动,席卷河南,此以逸待劳,万全计也。”(《宋史》卷四三五)这些建议有利于安定生产,增加军备,也适应了

高宗建国初以“守”为主的战略选择。

时隔一年，即南宋绍兴五年（公元1135年），朝廷恢复经筵，所讲内容多以《春秋》、《周易》为主，此间朱震连续擢升八次，依次是秘书少监、秘书少监兼侍讲、承议郎、起居郎、资善堂赞读、中书舍人兼资善堂翊善、朝散郎、左朝请郎等。据史书记载：“范冲、朱震为翊善，朝论以二人为极天下之选。上亦尝谓鼎曰：‘前日台谏因对，语及资善之建，皆曰如朱震、范冲天生此二人为今日资善之用，可谓得人矣。’”（《中兴小纪》卷十八）朱震能在一年内迅速擢升，主要的原因是在经筵讲学时的突出表现。

期间，他又曾多次向高宗进谏，反对豪强兼并土地，官吏私加税赋，守令政令苛虐，连兴大狱伤及无辜等事件。他还非常重视朝廷对于人才的选拔，认为君主有时可以降低自己的身份，选拔出身低贱的人作为臣子。他说：“以君臣言之，以贵下人，卑有时而逾尊矣。得贱臣者苟利于宗庙社稷，则或出于屠贩、奴隶、夷裔、俘虏，不问其素可也。”（朱震《周易集传·鼎》，见《周易集结》卷五，以下所引出自《周易集传》者，仅标卦名和卷次）他又借《泰》卦说明君主应该重视人才。纳兰成德在《通志堂经解·汉上易传序》中，对此有专门的阐述，“子发之传亦云‘时已泰矣，苟轻人才，忽远事，植朋党，好恶不中，不足服厌人心，天下复入于否’。又云‘天地反复之际，小人必因君子有危惧之心，乘隙而动’。皆切中南渡君臣之病者，吾故表而著之书以为序。”他曾建议宋高宗，选任官吏应该慈祥仁惠并有治行之功，还希望朝廷编撰《古循吏传》一书，记载古今良吏的实绩，作为赏赐。朱震想以这种方式改变当时官场的黑暗，显然无济于事且迂腐可笑。高宗皇帝答曰：“不若有治行者进擢，无治行者随轻重责罚，自有劝惩，赐《循吏传》，恐无补于事。”（《中兴小纪》卷二十）

军事上，宋朝从太祖开始，就推行“将从中御”，防止武将专权，不受制于中央政府。宋高宗遵循祖法，对统兵在长江上游的湖北地区至下游江淮一带的将领岳飞、韩世忠、张俊、刘光世等，不时加以转移调动，这无疑会影响将士们的士气。朱震在《师》卦中说：“古者人君之用将……进止赏罚皆决于外，不从中制，是以出以有功”，又说：“任将不可不重也”，“自古任将不专，而致覆败者，如晋荀林父邲之战，唐郭子仪相州之败是也”（《师》，卷一），这些都是针对当时的军事形势而发的有价值的言论。

为了维持仓促之间组建的南宋政权，朱震在“德治”与“法治”间，更倾向于“德治”，反对法家以苛刻残暴的刑律统治百姓，主张君主应该审慎用刑，以德服人而不是凭借暴力镇压人民，如他解释《噬嗑》卦：

或曰：“用刑言噬，何也？”曰：“此圣人之深意也。夫示之德让，使人

安于至足之分则不争，不争则无讼。今物至于噬而后合，德下衰矣。噬之当也，犹愧乎无讼，矧噬之有不当乎？末流之祸，怨乱并兴，反覆相噬，且万物同体而使物至于噬，自噬之道也。”（《噬嗑》，卷三）

《噬嗑》的本义是用刑，而朱震以用刑为道德下衰的表现。这一理解与理学家程颐不同。程颐解此卦说：“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，当用刑罚，小则惩戒，大则诛戮以除去之，然后天下之治得成矣。”（《周易程氏易传》卷二）以用刑为正当合理的统治手段。然朱震认为，圣人以德治理天下，使百姓安居乐业而无争斗和诉讼，这样的社会才是德治的社会。一旦社会上出现了争斗和诉讼，即便是合理的，也说明社会道德在衰败，至于不合理的争斗和诉讼，更是祸患无穷，自取灭亡。这显然是儒家理想化了的太平盛世。

二、往来于理学家之间

朱震所处的这个年代，朝廷内部政治和学术最大的分歧，就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理学和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之间分庭抗争。理学在北宋基本上处于弱势，到了南宋初期，形势有所变化，理学势力日益壮大。建炎元年（公元1127年），宋高宗在南逃的过程中，任命杨时为工部侍郎。杨时是程门高足，当时已七十五岁。杨时建议高宗，应以“讲学为先务”。建炎二年（公元1128年），高宗逃到扬州，即开经筵讲《资治通鉴》，由侍讲王寅讲《论语》，并将司马光配享宗庙。高宗讲史，推崇司马光，对王安石的学说自然有所疏远。时任礼部侍郎的王绷建议，科举考试经义，应当按照古注，不应当专用王安石的学说，高宗表示同意。人事上，曾经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被列为党人的，名誉也逐步得到恢复。建炎二年五月，首先为苏轼恢复名誉和曾经享有的一切待遇。建炎四年（公元1130年），高宗下诏，为元祐党人一一恢复名誉，并追赠吕公著、吕大防、范纯仁等为国公和大师。学术上，高宗不断向程学靠近。绍兴元年（公元1131年），高宗和中书舍人洪拟等讨论什么是帝王之道。高宗认为，君主必须正心诚意，而正心诚意的基础，是学问，“人欲明道见理，非学问不可。唯能务学，则知古今治乱成败，与夫君子小人善恶之迹。善所当为，恶所当戒。正心诚意，率由于此。”（《续资治通鉴》卷一〇九）就在这年八月，高宗追赠程颐直龙图阁，并褒奖程颐“自得于正心诚意之妙”（同上）。自从宋徽宗崇宁以来，理学被贬黜，值此重新推崇二程学统，是对理学发展的一次促进。

朱震自称在学术上受宋代理学家影响较大。他在《进易表》中称其学“以《易

传》为宗,和会雍载之论”,这里所说的《易传》指的是程颐的《伊川易传》。经统计,朱震于六十四卦注解中,明引程颐《易传》处,就有一百条之多。^①这充分说明了他的易学和理学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。

二程后学以谢良佐和杨时最为有名,黄宗羲在《宋元学案》中说,二程之学由谢良佐和杨时继承发扬,至朱熹而集大成。朱震不及二程之门,但与谢良佐关系密切,全祖望在《汉上学案序录》中云:“上蔡之门,汉上朱文定公最著。”(《汉上学案序录》,《宋元学案》卷三七)将朱震列为上蔡门人中之最优者。另据《上蔡学案》记载,谢良佐监西京竹木场时,朱震曾偕弟朱巽前往拜见。饭余茶罢,谢良佐亲自为其讲解《论语》中的《子见齐衰者》和《师冕见》。这两章本来是讲儒者日常的行为规范,对老弱鰥寡者给予尊敬、同情和帮助,而谢良佐却以程颐的理学思想解释,他说:“夫圣人之道,无显微,无内外,由洒扫应对进退而上达天道,一以贯之,一部《论语》只恁地看。”(《上蔡学案附录》,《宋元学案》卷二四)其后又写信劝勉朱震宅心道学,持之以恒,以明道先生为榜样。

胡安国是宋代另一位理学大师,与朱震同仕于朝堂之上。在太学读书时,曾以程颐之友朱长文为师。他虽不是程门弟子,但推崇并钻研《程氏遗书》,从中获得了理学思想,并且加以坚持。他和程门高足杨时、谢良佐、游酢等人都很接近,关系介于师友之间。谢良佐曾对朱震说:“康节(胡安国)正如大雪严冬,百草萎死,而松柏挺然独秀。”(《胡文定公行状略》,《伊洛渊源录》卷十三)足见他气节不凡。其为人耿直,不趋炎附势,重操守,讲忠信,实为有宋一代难得的忠臣。胡安国于北宋哲宗绍圣四年(公元1097年)进士及第后,任荆南教授。荆门是朱震的旧游之地,从那时起,两人相识。据《宋史》记载,朱震与胡安国关系友善,胡氏非常器重朱震,亲自将其推荐给宋高宗。朱震也曾拜谒安国,向他请教基本的为人处世之道。

就在程颐追赠直龙图阁不久,绍兴六年(公元1136年),朝廷内发生了左司谏陈公辅上疏请禁程学的事件。奏疏中说:“今世取程颐之说,谓之伊川之行……倡为大言,谓尧舜文武之道传之仲尼,仲尼传之孟轲,轲传颐,颐死无传焉。狂言怪语,淫说鄙喻,曰此伊川之文也;幅巾大袖,高视阔步,曰此伊川之行也。能师伊川之文,行伊川之行,则为贤士大夫,舍此皆非也。臣谓使颐尚在,能了国家事乎?取颐之学,令学者师焉,非独营私植党,复有党同之弊……伏望圣慈特加睿断,察群臣中有为此学,相师成风,鼓扇士类者,皆屏绝之。”(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一〇七)朱震对此事没有进行争论,“时朱震在经筵,不能净,论者非

^①参见侯外庐等主编《宋明理学史》上卷,第264页,北京:人民出版社,1984年

之。”(《续资治通鉴·高宗绍兴六年》)绍兴七年(公元1137年)正月,朱震向宰相张浚提出离职,没有得到允许。朱震的老友胡安国闻之,写信给其长子胡寅说:“子发求去,晚矣。当公辅之说才上,若据正论力争,则进退之义明。今不发一言,默然而去,岂不负平日所学,惜哉!且复问宰相云某当去否,既数日又云今少定矣,岂能为国远虑,平生读《易》何为也?”(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一〇八)于是胡安国自己上疏为程颐辩护,并要求给二程、张载、邵雍加封号,后因此事牵连而被免职。

冒怀辛先生曾撰文分析这一事件,认为理学家从其本身立场看,自认为君子,而认反理学的为小人,在胡安国看来,君子小人是相容的,而朱震却另有一套看法,他对理学家所认为的小人抱着和光同尘的态度,既不近之,也不远之,不疏不亲做到各得其所,朱震的《汉上易传》就表明了这样的见解:

天下恶人众多,疾之已甚,人人以君子为敌,是睽者既合而复睽,斯亦君子之咎也。(《睽》,卷四)

小人远之则怨,怨则所以害君子者无所不至。……是以莫之怨亦莫敢侮,而君子小人各得其所。(《遯》,卷四)

自古观其君而去者,以未平之志为忿世疾邪之事,多失之于矫激太过,岂能无咎?(《观》,卷二)

汉唐之乱,始于小人为险,君子疾之已甚,其弊至于君子小人沦胥以败,而国从亡。(《讼》,卷一)

冒怀辛先生以为,朱震的见解更加符合儒家的传统,那就是要像孔夫子那样“以直报怨”,用仁义道德来对待反对者。^①

笔者以为,朱震的态度,反映了他在为学和为人上一以贯之的中庸之道。从学术的角度看,朱震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尤其是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的影响。陈公辅请禁理学时,恰恰就是以孔孟之道尤其是《中庸》为根据:“且圣人之道,凡所以垂训万世,无非《中庸》,非有甚高难行之说,非有离世异俗之行,在学者允蹈之而已。……学者但能参考众说,研穷至理,各以己之所长而折中焉。惟不背圣人之意则道术自明,性理自得。”(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一〇七)考朱震《汉上易传》一书,就是包括异同,折衷众说,而以己所长象数之学为主。这种学术理念反映在其处世之道上,自然表现为一种明哲保身的中庸之道。朱震解《观》卦上九“观其生,君子无咎”时说:“知微知彰,知柔知刚,然后能观其生而不失进退之几

① 详见侯外庐等主编《宋明理学史》上卷,第255页,北京:人民出版社,1984年

焉。”(《观》,卷二)事物的发展有正反两个方面,把握其进退之几,就能保全生命。又说:“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,好讥议人也。辩博阔远而危其身者,好发人之过也。”(同上)“轻易者自塞其耳而聪不明也。陆机羁旅,处群士之上,而不闻牵秀孟玖之毁,其以高亢轻易而致祸乎?”(《旅》,卷六)保全自己的最佳方法,就是不去轻易地评论或讥讽他人的过错,做到君子小人各得其所。

此事件后,他觉得有愧于同朝为官的友人,先是求去以谢诸友,后见高宗并没有禁止程学的意图,才稍加安定。他与胡安国的性格形成对比。胡氏个性鲜明耿直,刚正不屈,朱震谨慎拘谨,明哲保身,无怪他后来感叹,“知臣者以臣为守义,不知臣者以臣为守株。”(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一一九)

胡安国被免职两个月左右,又被高宗召回京城。这次被召进京,他献上了自己撰著的《春秋传》,朱震请求下诏嘉奖其书。胡氏去世时,朱震上表称其“正义直指,风节凜然”,“孝于亲,忠于君,好学不倦,安贫乐道。”(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一一九)由于朱震的请求,高宗下诏赠为四品,赐田十顷,并谥为文定,所受礼遇“实出常格”(同上)。

此前,理学家杨时病歿,朱震也曾为其请谥。他上表说:“时学有本原,行无玷缺,进必以礼,晚始见知。其撰述皆有益学者。”(《续资治通鉴·高宗绍兴五年》)由于他的上疏,高宗下诏取阅杨时的《三经义辨》,并赐其家帛二百匹,谥“文靖”。另据《汉上易传》所载,朱震曾向程颐晚年弟子郭忠孝请教历法。

绍兴七年(公元1137年),时任太常少卿的吴表臣奏请举行明堂之祭,原在绍兴四年(公元1134年),高宗皇帝就曾举行过这样的一次典礼。绍兴七年,徽宗帝后相继在五国城去世的消息传来,神主尚未进太庙,朱震据《礼记·王制》“丧三年不祭”,认为不应该举行明堂大祭。高宗下诏,由群臣参议此事,最后采用了御史赵涣和陈公辅的建议,决定举行明堂祭祀。这年朱震称病辞官,高宗一再挽留不允。此后不久,胡安国和朱震继杨时之后,相继亡故,胡氏于绍兴八年(公元1138年)二月在湖南衡山去世,朱震于六月在临安去世。朱震临终之前,推荐由程颐的弟子尹焞代替自己的经筵讲职。高宗对朱震等人的去世,十分痛惜,据史书所载:“夜震卒,年六十七,中夕奏至,上达旦不寐。戊寅辅臣奏事,上惨然曰:‘杨时既物故,胡安国与震又亡,同学之人,今无存者,朕痛惜之。’”(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一二〇)

以上事实说明,朱震与朝廷内理学家往来甚多,其易学思想中的许多理论,都得益于当时的理学家。北宋时理学家对《周易》的阐释,大致可分为两派:一派是以义理的方式注《易》,这是北宋易学发展的主流,代表作是程颐的《伊川易传》和张载的《横渠易说》;一派是经由图书解《易》而与理学思想相契合的,如邵

雍的《皇极经世》和周敦颐的《太极图说》。朱震站在象数易学的角度,不仅对理学家以义理注《易》有所吸收,而且将理学之常用范畴如体、用、理、气、道、性、命等纳入其易学体系,尤其在本体论的建构方面,他深受张载气化论的影响,坚持以太极之气解释物质世界的产生和变化。这些都说明了他对当时的理学家和理学思想是很推崇的。

三、主要著作

行世的主要著作是《汉上易传》。“汉上”二字,胡一桂《周易启蒙翼传》主张朱震号“汉上”,居蒙泉。《四库提要》以为,其书题为“汉上”,“盖因所居以为名”。朱震在绍兴六年(公元1136年)秋,将此书进呈高宗。他在《进易表》中说:“起政和丙申终绍兴甲寅,成《周易集传》九卷、《周易图》三卷、《周易丛说》一卷。”这里朱震称《周易集传》九卷,与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所录及现存《周易集传》十一卷不同。若以九卷论,则不包括《序卦》注、《杂卦》注两卷,然这二篇传注从思想内容上看,当属朱震作无疑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题解》云:“序称九卷,盖合《说》、《序》、《杂》为一也。”(《直斋书录题解》卷一)陈说可信。这三部易学著作合在一起,便是后人所称的《汉上易传》。朱震以十八年心血完成此书,此后历代均以《汉上易传》为其代表作。今存有涵芬楼影宋本(缺《易图》和《丛说》),清初《通志堂经解》本、《湖北先正遗书》本及《四库全书》本。本书主要参考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另外,据现存史书的记载,朱震曾精心研习《春秋》。靖康元年(公元1126年),朱震被授为《春秋》博士,朝廷制词称其“推明三家之同异”(《汉上先生履历》)。南渡后,绍兴五年(公元1135年)五月除起居郎的制词说:“以尔习于《春秋》,明乎褒贬,经筵劝讲,开益为多。”(同上)另据《玉海》,“绍兴《春秋口义》,绍兴中侍讲朱震讲义三卷。”(《玉海》卷四十)可见朱震对《春秋》经传皆有深入地研习,只是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著作流传。

关于《诗经》,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载有朱震讨论《诗经》的一段议论,原文是:“朱子发曰,《诗》全篇削去者,两千六百九十四篇,如《豳首》、《曾孙》之类是也;篇中删章者,如‘唐棣之华,偏其反而,岂不尔思,室是远而’之类是也;章中删句者,如‘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,素以为绚兮’是也;句中删字者,如‘谁能秉国成,不自为政,卒劳百姓’是也。”(《困学纪闻》卷三)朱震是否有进一步的论述不得而知。

朱震的其他作品,见于史料的,有一些代朝廷拟的诏诰。此外,他曾编《荆门蒙泉题咏》,搜集唐宋二十七家蒙泉题咏。今有《荆门崇封龙女记》碑文存世。

第二节 易学思想的主要特征

朱震的易学,主要有两个特征:一是以象数之学为易学研究的基础,着重阐发象数易学的理论;一是广泛采辑并折衷各家之学,融汉代象数易与宋代先天河洛学于一炉。具体内容如下:

一、以象数为易学之正统

朱震有感于魏晋以来义理学盛行而象数学衰退的局面,决心复兴象数易学于危难之中。为此,他将象数视为易学发展之源,重点阐述象数易学的理论,以凸显其正统性。尽管其易学思想的部分内容涉及义理,但他是以象数为理论依据而解释义理,这是朱震易学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。

(一)结合《周易》经传,朱震提出了易象为《周易》成书基础的理论。

从根源讲,《周易》中的象数,源于阴阳之气,但就《周易》本身构成而言,却是以“象”为基础。朱震认为,一部《周易》,就是由象所组成,离开了象,则没有《周易》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他提出“《易》者,象也”(《乾》,卷一)、“《易》无非象也”(《复》,卷三)。朱震指出,易象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,一是卦象,一是爻象,《系辞》中“象也者,言乎象者也”,是言卦象;“爻象动乎内”,是言爻象。结合《周易》经传,朱震阐述了易象与《周易》的关系。

首先,《易经》中的卦爻辞是圣人为了“观象”而设,也就是说,易辞是圣人担忧后世不知观象或观之不足而系的辞。朱震解释《系辞》“圣人设卦观象”一节时说:

圣人设卦,本以观象,不言而见吉凶。自伏羲至于尧舜文王,近者同时,远者万有千岁,其道如出乎一人,观象而自得也。圣人忧患后世,惧观之者,其智有不足以知此,于是系之卦辞,又系之爻辞,以明告之,非得已也,为观象而未知者设也。(卷七)

《周易》的本来面貌,就是只有六十四个卦象而没有卦爻辞,这是伏羲画卦

的时代。伏羲氏只是教人观察卦象,推测吉凶。后来的圣人,忧虑后人不能通过观察卦爻象而知吉凶,于是系以卦爻辞,解释卦爻象,这是文王、周公之时。据此,《易经》形成的整个过程皆以卦爻象为基础,易辞也正是为了说明卦爻象,易象先于易辞而存在。他在解释《系辞》“彖者,言乎象者也”时,又重申了这一观点,认为彖辞是用来解释象的,万一不解彖辞也无妨,只要能做到观象而得就可以了。

易学研究发展到现在,当人们以现代的视野解释《易》中象与辞的关系时,提出《周易》中有两种符号系统,即卦画符号系统与文字符号系统。文字系统基本上是对事物、思想从实际的层面上予以显示,卦画系统则不同,通过卦画,不可能直接知道事物和思想的实际情形。但是,先于卦辞而产生的卦画,从《周易》卜筮的实际过程看,预测着事物和思想发展的趋势,起着一种根本的引导和指向作用。^①今人所作的这种解释,与朱震关于《易经》成书两个阶段自然进程的叙述,思想基本上是相吻合的。

其次,《易传》各篇都是用以阐述易象的。

其一,就《彖传》、《大象传》和《小象传》而言,这三篇都是以取象为基础。朱震说:“《易》无非象也,《彖》也,《大象》也,《小象》也。其象各有所宜,不可以一概论。”(《复》,卷三)认为《彖传》、《大象传》、《小象传》分别从各个角度表现和说明易象,三者在取象上各有特点,分别适宜不同的情况和场合,不可一概而论,但它们又相互表里,“夫子之《大象》,别以八卦取义,错综而成之,有取两体者,有取互体者,有取变卦者,大概《彖》有未尽者,于《大象》申之。”(《乾》,卷一)《大象》的取象体例主要有两体说、互体说和变卦说等,这些体例是对《彖传》取象的补充说明。

其二,充分重视《说卦》中八卦所取的物象。朱震在《集传》中对《说卦》中八卦所取的物象详加注解和考证,从汉易到宋儒皆有引述,且文字与注解《系辞》的文字数不相上下,表明他十分重视以八卦所取的物象解释卦爻象和卦爻辞。

八卦之物象,是象数易学家注解《周易》卦爻辞,取象推占必不可少的工具和现成的依据。为了达到以象释辞、以象解占的目的,易学家们苦心经营,覃思竭虑,不断变换取象的方式,发明一些新的体例,以求得八卦,然后再根据需要,从《说卦》中取八卦的某一物象。然而,往往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,虽然几经周折,从六画卦中推出八卦中的一卦(或者多个卦象),但是在《说卦》所陈的八卦之象中又找不到所需要的物象。为了摆脱这个困扰,易学家除了变换体例外,又

①王树人、喻柏林《周易的“象思维”及其现代意义》,《周易研究》,1998,1